



三百年江山 十二帝兴替 成败兴废弹指间

大清皇帝正说

下册



(台湾) 高阳



大清皇帝正说

下册

(台湾) 高阳◎著

版权图字：01—2004—62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皇帝正说 / 高阳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48-0

I. 大... II. 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567 号

高阳作品集
大清皇帝正说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韩金英

特约编辑: 王 英

版式设计: 领读工作室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 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50.5

字 数: 80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30-948-0 / I · 63

定 价: 6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勘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骅，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官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來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么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01 皇帝的种种	001
02 爱新觉罗的祖先	023
03 太祖、太宗	027
04 世祖	084
05 圣祖	115
06 世宗	223
07 高宗	269
08 仁宗	409
09 宣宗	450
10 文宗	474
11 穆宗	510
12 溥宗	644
后记	791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794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796

08 仁宗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高宗在圆明园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这位嗣皇帝就是仁宗。

仁宗御名颙琰，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寅辰十月初六日，这年高宗五十岁。生母魏佳氏，原为包衣女子。高宗之以仁宗继统，原因有三：第一、预定践祚六十年后归政，年已八十有五，稍长诸子，亦在五十岁左右，精力已衰，须择一盛年之子，此为圣祖当年所以欲传位于皇十四子的原意。高宗能体祖父的苦心，并以为法，此实不愧英主。

其次是仁宗之仁，高宗自知十大武功，六次南巡，以及不断扩充圆明园，重劳民心，希望仁宗施政以宽厚为主，而仁宗的性格符合他的要求。再一个原因便是包衣女子所生，自幼得祖母钟爱。

据《东华录》，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戊申朔，举行授受大典，仪节如下：

- 一、嗣皇帝侍太上皇帝诣奉先殿堂行礼。
- 二、遣官祭太庙后殿。
- 三、太上皇帝御太和殿，规授“皇帝之宝”。嗣皇帝跪受。
- 四、太上皇帝受贺还宫。
- 五、嗣皇帝即位受贺。
- 六、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颁行天下，覃恩有差。
- 七、嗣皇帝奉太上皇帝诣寿皇殿行礼。
- 八、嗣皇帝御乾清宫，赐宴亲藩。

从这天起，便有了两个年号：民间称“嘉庆元年”，宫中称乾隆六十一年。在高宗以前，唐、宋皆有太上皇，一是唐高祖，二是唐玄宗，三是宋高宗。但此三帝禅位，皆出于不得已，理智上虽多少有不足以君临天下之惭，而情感上实难甘心。因此，父子之间，亦有猜忌。

宋孝宗为宋高宗之侄，且为宋太祖之后，祖宗骨肉间的恩怨，更易造成误会。高宗熟读《通鉴》，深知“太上皇帝”名义好听，而做“太上皇帝”的滋味并不好受。尤其和坤更为自危，非助高宗继续掌握政权不可。据朝鲜正宗实录载：

(正宗)二十年,即清嘉庆元年,三月十二日戊午,召见回还进贺使李秉模等。上曰:“太上皇筋力康宁乎?”秉模曰:“然矣。”上曰:“新皇帝仁孝诚勤,誉闻远播云,然否?”秉模曰:“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央此亦有可知者矣。”

李秉模于二月十九日乙未,先有驰启言:“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礼部知会,诣圆明园。午后,与冬至正副使入山高水长阁。太上皇帝出御阁内后,入参内班。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黄昏时,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后御小舫,嗣皇帝亦御小舟随之。又令臣等乘舟随后。行数里许下船,入庆丰园,太上皇帝御楼下榻上,嗣皇帝侍坐,设杂戏赐茶,使内侍引臣乘雪马行,一里许下岸,仍为引出退归。”

……臣等使任译问:‘从今以后,小邦凡有进奏进表之事,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进一度耶?’答云:‘现今军机处未定例,当自有文书出去’云。申后,礼部又送上马宴桌于馆所。

二十六日,礼部知会有传谕事件,年贡宪贺各该正副使明日赴部。故二十七日巳时,臣等及冬至正副使、与任驿诣礼部,则员外郎富森阿誓示传谕事件,以为贺使带来三起方物,业经钦奉敕旨,移准于下次正贡。再次奉敕旨:‘此后外藩各国,惟需查照年例,具表贡贡,毋庸添备贡物。于太上皇帝、皇帝前作两份呈进’云云。”

又清人笔记中记董诰轶事云:

嘉庆初元,坤势益张,外而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而掌铨选理财赋决狱讼主谏议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顺其意则立荣显,稍露风采,折挫随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衍文学受两朝知遇,扬历中外,垂五十年,时以内禅礼成,例得进册,坤多方遏之,既上,坤又指摘之。纯皇帝谕曰:“师傅之职,陈善纳诲,体制宜尔,非波所知也。”

旋召公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仁宗作诗寄贺,属稿未竟,坤取以向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耶!”上皇色动,顾董文恭公曰:“汝在军机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叩头曰:“圣主无过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为朕以礼辅导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两广总督之任,旋又改巡抚安徽。是时直内廷者无不色变震恐,文恭独从容谢过,书旨而退,右见《刘礼部集》。

读此文见文恭之忠亮格天,深心调护,真有功宗社之大臣,亦由两朝圣人善作善述,止孝止慈。训政者一时罔极之心,传祚者万世无疆之业,卒非金壬所能荧听也。

按:朱文正指朱珪,与弟朱筠,并为乾嘉名臣,《四库全书》之议,即起自朱



筠，而《清史稿》不为立传，深知心史先生所讥责。

朱氏兄弟京师土著，籍隶大兴，而原籍浙江萧山，先世殆为明朝六部的书办。朱珪字石君，乾隆十三年翰林，开坊后外放福建粮道，循升转，三十六年以山西按察使护理巡抚，四十年内调，监司转内，以“对品”之例，应授为“大九卿”，不知为何竟授补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但次年命在上书房行走，专为仁宗授课。

其时仁宗年十七，天心默许，大位所归；为储君择师，选定朱珪，足见器重。但不久和坤已渐用事，或者在拥立一事上，别有深心，因而于四十四年外放福建主考，次年京察一等，照例应即升官，而竟以原衔补放这政，任满回京须在四十八年，此为有意隔离其师生。

朱珪已知所辅者为储君，亦知和坤有移易高宗之意，因进五箴于仁宗；五箴者“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皆有深意，所谓“养心”就是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勿以得失萦怀，这是设想到高宗可能会受和坤的蛊惑而易储；倘遇此拂逆，切须顺受；“敬身”者勿荒于声色，“勤业”则力学；“虚己”谓以谦和为贵；“致诚”者但尽其孝悌之心，勿矫揉造作。

凡此皆深知高宗的性格，孝以固爱之道。仁宗于此五箴，所下工夫甚深，以致数中危言，即在受禅后，和坤还想扳倒他，而终得无恙，皆由朱珪辅导之功。因而歿后得谥为“文正”。

四十七年九月，朱珪升少詹为东宫官属，而仍不容于和坤，五十一年以礼部侍郎充江南乡试正考官；凡遇乡试正科之年，即为学政任满之时，朱珪在闱后即授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未几即外放为安徽巡抚。至此，朱珪出一高着，保护仁宗。

此一着之高，乃在能摆脱和坤之影响，非和坤所能论其是非。和坤在乾隆五十年后，无所不管，与高宗关系之密，密到一起修持“密宗”，惟独文字一道，除了奏折上吹毛求疵之外，其他即无置喙的余地。

高宗自负学问，尤自负于义理；在这方面对和坤毫不假以辞色，常有“此非汝所知”之词。因此朱珪乃以文字结主知；而以疆臣司文学侍从之职，如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谕：

昨日安徽巡抚朱珪，进《御制说经文》，阅其后跋，以朕说经之文，刊千古相承之误；宣群经未传之蕴；断千秋未定之案；开诸儒未解之惑，颂皆过当，但历举朕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各大端，见诸设施者，与平日阐发经义，实有符合，语皆纪实，并非泛为谀词。朱珪于御制古文，细绎推阐，能见其大，跋语尤得体会，殊属可嘉。着赏给笔墨等件，以示奖励。

朱跋“刊、宣、断、开”四语，在高宗实在过瘾之至；作“颂皆过当”的谦词，可见其内心对朱珪的欣赏。

五十九年四月又谕：

朱珪进御制论史古文后跋，以朕论史之绌绎推阐，有“用史成经，绍六为七”之语，朱跋语，固非铺张扬厉，泛为谀词，究属称颂过当，观其文义，尚为典覆，着赏给纱扇笔墨等件，以示奖励，此册并着皇子皇孙，各缮一部，预备观览。

按：诗、书、易、礼、春秋、乐为六经；乐经失传，故称五经。朱珪颂以“用史成经”，使六经变为七经，真是挖空心思的恭维，高宗又大过了一次瘾，看他“着皇子皇孙，各缮一部，预备观览”，可想见其得意。

同年九月又谕：

朱珪进理《御制纪实诗》十二函，内编排门类，列叙案语，具见用心审密，所撰进书表文，摘词比事，亦属典覆，惟过于颂扬，于朕兢业自持，终日孜孜之意尚觉歉然，观其属辞命义，尚为雅则。兹赏给御箴扇一柄、纱匹笔墨等件，以奖其励学。

此则俨然师长训门生之语，关系较之君臣又进一步。而朱珪则再接再厉，以致又有十二月之谕：

朱珪进呈《御制几余诗》一部，朕略加披览，系缮录御制诗章，分门别类，编辑成帙，可谓用心细而措辞当。该抚应办地方要务甚多，若专用于笔墨之事，恐致政务转不免疏漏，岂朕简畀封圻之意，除颁赏荷包笔墨硃锭外，着传谕朱珪务须尽心政务，以察吏安民为重，不可缓其所重，用心于无用地。嗣后亦毋庸再行纂办进呈，惟当悉心民事，以期无负委任。

按：其时朱珪由安徽巡抚调广东，此为肥缺，亦为要缺，所以高宗有此一谕。话虽如此，两个月后的六十年二月，又以释奠文庙礼成，临幸辟雍，御制诗四章，特命朱珪恭和进呈。至此，朱珪已立于不败之地；朱珪不败，仁宗的地位可保不致发生变化，因爱屋及乌，自然之理；而既有名师，必出高徒，亦逻辑推演所必至。和坤进谗而不逞，因由董诰为社稷之臣，而基本上还是看在朱珪的份上。

及至授受礼成，朱珪撰进诗册，用“二十五有”的仄韵，成排律一百韵，又蒙奖赏；嘉庆元年六月擢粤督仍兼粤抚，其时文渊阁大学士孙士毅出缺，高宗决定以朱珪补授，先下上谕“来京另候简用”；接下来又颁另一道上谕：

昨据和琳奏：孙士毅在四川西阳州病逝，将来大学士缺，意欲即以朱珪补授，但此缺须一月后方始题请，特先降旨，谕知朱珪，不必因有来京之旨，心存疑虑，



见在京中并无应办之事，朱珪不必急于来京，两广总督仍应朱珪署理。

朱珪在广东巡抚任内，办理一切，本为熟悉，今复奉有恩旨，尤应感激奋勉，倍加认真，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见，有负委任，一切洋盗更应严办，大学士员缺，除俟届期明降谕旨外，外此先行传谕知之。

这是和坤阻挠朱珪到京的一种手法，这道上谕是个伏笔，八月间根据闽浙总督魁伦所奏，“粤东艇匪，驶至闽浙洋面肆劫”，课朱珪以“署总督任内，不能认真缉捕”的罪名，调补安徽巡抚。

和坤敢于如此弄权，是因为高宗老年善忘之故：嘉庆二年，朝鲜李朝实录载：

三月二十二日丙戌，冬至书状官洪乐游进闻见别单，中有两款关太上皇帝及皇帝状：（一）太上皇帝容貌力气，不甚衰毫，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坤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

（二）皇帝起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所受。故筵臣之敷奏文义者，俱得尽意。阁老刘镛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镛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坤云。

按：刘镛为刘墉之误。嘉庆元年政府领袖为阿桂，以武英殿大学士为军机领班，其次为和坤；刘墉不入军机，以滑稽自容，故仁宗虽加信任，得免猜忌。和坤最忌者为朱珪，因为朱珪久任疆吏，内用必入军机，且必为高宗经常召见，谈文论艺，和坤即无法一手遮天。其次则为王杰，此人所得的状元，即原为赵云崧应得的状元。一生清慎守正，不负特达之知，亦为高宗所极信任，和坤无可如何。但在军机，仅常止予和坤难堪，或者遇事保全善类，毕竟无法事事匡正。

《清朝野史大观》记：

公高不逾中人，白发数茎，和蔼近情，而时露刚毅之气，其入军机时，和相势力薰赫……公绝不与之交，除议政外，默然独坐，距和相位甚远，和相就与之言，亦漫应之。高宗极信任公，和亦不能夺其位。

王杰籍隶韩城，与司马迁同乡，司马迁的墓及庙便在韩城；自幼仰慕乡贤，嫉恶如仇，《清朝野史大观》记：

海盐陈太守谏，精岐黄家言，官礼曹时，枢相和坤召令视疾，太守咨于座主韩城王文端公，曰“此奸臣，尔必以药杀之，否则毋见我。”太守谢不往，和疾之时，已保御史，乃出为巩昌知府，复以事贬知州。

按：陈族孙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亦曾述其事，当非无稽。王杰在军机，对

和珅不假辞色；而和珅低声下气，刻意交欢，则为事实。

清人笔记中又一条云：

大学士和珅在军机日，手持水墨画轴，韩城师见之，曰“贪墨之风一至于此”。又尝捉韩城手谛视曰：“状元宰相手果然好。”韩城曰：“这手但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好处？”闻者凛然。

按：世皆以王清廉著称，告老时仁宗制诗送行，有“清风两袖返韩城”句；事实上，所谓清廉，亦是比较而言，太平宰相，国家自有俸禄，亦不致如汤斌、于成龙等任督抚时的刻意清苦，以期将身作则，矫正吏治。

王杰自通籍至参政，掌文衡九次，三任浙江学政，一任福建学政；光是门生例有的赞敬，就很可观了。

昔人咏穷京官紧缩开支云：“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此犹言三节两寿（老师、师母生日）例有的孝敬，亦非万不得已不可裁，至于进学、中举，中进士的献赞，岂惟绝不算贪墨，且受者为荣，王杰何等例外，倘或例外，便是矫情，亦不能得高宗的信任了。

王杰之能叠掌文衡，实际上是和珅的惯技，一以示惠，兼以隔离。和珅用事在乾隆四十多年以后，其时王杰由浙江学政任满回京任吏侍，四十三年出为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五年又任浙江学政，四十七年回京，旋丁母忧，至五十年八月服满进京，任兵部尚书。此时和珅羽翼已丰，势不可撼。

王杰于五十一年十二月入军机，五十二年一月入阁，是年丁未正科会试，五十四年己酉，高宗八旬万寿，颁行正科会试，五十五年庚戌恩科会试，王杰三充总裁，为和珅弄权，更为显然。

因为一人阁便是一个多月，榜发以后门生拜老师，接着殿试、朝考，扰攘之间，总有半年不得宁帖，即半年不能过问政事。和珅以此手法对付王杰、刘墉、朱珪、窦光鼐等人，可说万试万灵。

仁宗在位二十五年，实际上应该算作二十二年，因为前三年完全是傀儡，直到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崩，方始亲政，才能算是真正在做皇帝。

仁宗一旦大权在握，第一件事便是杀和珅。犹恐和珅势力太大，不愿就范，特以亲贵分掌朝政，当时的处置是：

- 一、皇八子，仁宗胞兄仪郡王永璇，晋封亲王，总理吏部。
- 二、皇十一子，仁宗胞兄成亲王永理，命在军机处行走，并总理户部三库。
- 三、仁宗同母弟，皇十七子永璘封惠郡王，后改号庆郡王，为御前行走，负内



外联络之任。

至于参和珅者，不一其人，《东华录》只记：“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

《清朝野史大观》记如下：

和珅用事二十余年，至嘉庆三年以前，未尝一被弹劾。乾隆间御史曹锡宝虽尝一劾其家奴刘全藉势招摇，家资丰厚；然廷闻查勘，竟以风闻无据复奏，锡宝坐妄言被诘责。及嘉庆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和珅始为御史广兴、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所劾，即日夺职下狱，寻赐自杀。

其家财先后抄出，值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因此，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谣。而和珅当日曾向仁宗递如意，以为可以邀拥戴之恩，不道竟成大罪的第一款。

和珅的罪名据上谕宣布，共二十大罪：

一、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泄露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

二、上年正月，皇考于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

三、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

四、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

五、自剿办川楚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紫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

六、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谈笑如常。

七、昨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

八、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吏部、刑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九、上年十二月，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在青海肆劫。和珅竟将原折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

十、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全不顾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

十一、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曾在伊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

十二、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

十三、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榻段，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十四、蓟州坟茔设立亭殿，开置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

十五、家内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较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

十六、宝石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数十，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

十七、银两衣服等件，数逾千万。

十八、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藏埋银两三百余万。

十九、附近通州、苏州有当铺、钱店，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

二十、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家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

以上二十款大罪，强调“大不敬”，始能处和珅以死刑，因为位至大学士，贪黜不算可以致死的大罪。原来清朝自康熙年间起，造成一个很不良的传统，凡是到了与国同休的地位，诸如宰相、负实际责任的王公，乃至督抚，贪污是可以容忍的。

圣祖甚至以清官著称的张伯行，都有假公济私的行为，说他如果不取之于民间，何来刻书之费；事实上是冤枉了张伯行，张家素封，张伯行刻书，出于私财。不过圣祖既未认真，臣下亦不必深辩而已。

究其实际，和珅的大罪只是“紊乱纲纪、败坏吏治”八个字；但此八字，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所以不能不“毛举细故”以成大罪。

明朝末年有部书，名为《天水冰山录》，专记籍没严嵩父子的财产，和珅抄家所得，清朝档案中，亦有记载，稍录若干，以广见闻：

私设档子房一所，共七百三十间。

花园一所，亭台六十四座。

田地八千顷。

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

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

（金库）赤金五万八千两。



(银库)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

京镲五百八十三万个。

苏镲三百一十五万个。

(人参库)人参大小支数未计，共重六百斤

(玉器库)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罄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柄。玉碗十三桌。玉寿佛一尊，高三尺六寸。玉观音一尊，高三尺八寸(均刻云贵总督献)。玉马一匹，长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以上三件均未作价)

珊瑚树七支，高三尺六寸，又四支，高三尺四寸。

白狐皮五十二张，元狐皮五百张，白貂皮五十张，紫貂皮八百张，各种粗细皮共五万六千张。

镂金八宝状四架，镂金八宝炕二十座，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二百五十六座，桌钟三百座，时辰表八十个。

皮衣服共一千三百件，绵夹单纱衣服共五千六百二十四件，帽盒三十四个，帽五十四顶，靴箱六十口，靴一百二十四双。

大珠八粒，每粒重一两。

金宝塔一座，重二十六斤。

大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

大银元宝五百个，每个重一千两。

按：和坤所得财物，亦非尽由督抚中勒索而来，最主要的一种手法是侵冒，他在军机处时曾有一不成文规定，奏折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倘或不如所欲，擅自驳斥，而名义上是驳了，实际上却纳入私邸，督抚反正已进贡了，当然不会再讨回，而且和坤一收下，则驳斥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已有保障。有时收一半，退还一半，此退还的一半，当然亦是和坤笑纳。

以此二十款大罪，罪名自是“决不待时”，即刑名上的专门术语：“斩立决”。结果是“赐帛”，伏法于正月十八日，距被捕为七日，跟太上皇之崩，未足半月。有清一代，王公大臣被祸之速，未有如此者。

和坤当政二十年，天下督抚，半出提携，倘如雍正之善株连，将无宁日，仁宗在这一点上做得很聪明，但也可能很不聪明，如当时能借此切实整顿吏治，尤其是对八旗贵族，痛切裁抑，讲求实学，应该不至于有后来鸦片战争一败涂地的惨局面。只是仁宗之仁，不忍株连，只办了少数人，列举如下：

一、左都御史吴省钦，一向为和坤门下走狗，革职回籍。